



风云人物

中华百杰传

清代风云人物 (三)

QINGDAIFENG YUNRENWU

本书编委会 编写

沈阳出版社

风云人物

中华百杰传

清代风云人物
(三)

QINGDAIFENGYUNRENWU

本书编委会 编写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风云人物. 3 / 《清代风云人物》编委会编写.

— 沈阳 : 沈阳出版社, 2014. 6

(中华百杰传)

ISBN 978-7-5441-5937-1

I. ①清… II. ①清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列传—中国—清代—青少年读物 IV. ①K820. 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28220 号

出 版 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 者: 沈阳富民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47mm×210mm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25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4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耿作军 焦 健 张 楠

封面设计: 盖哲锋

版式设计: 姿 兰

责任校对: 刘 洋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5937-1

定 价: 17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-mail : sy24112447@163.com

本书若有倒装、缺页、脱页现象, 请与本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左宗棠	3
洪秀全	67
洪仁玕	151
彭玉麟	207
丁宝桢	239



清代风云人物（三）

左宗棠

1885年9月5日这天，福州城台风呼啸，惊雷轰顶，大雨倾盆。城内大小官员以及平民百姓无不悲痛万分。因为曾收复新疆的功臣左宗棠在他的行辕里与世长辞了。临终时，左宗棠口授遗折：“惟此次越南和战，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，臣督师南下，迄未大伸达伐，张我国威，遗恨平生，不能瞑目。”从这铿锵悲壮的遗言中，可以看出左宗棠那一片爱国之心。



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晚（1812年11月10日），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坡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，梦见一位自称是“牵牛星”的神人从天空降落在她家的院子里，不禁一吓醒来。这时，同院的儿媳的房中一片白光，竟把灯烛闪得黯淡不明，过了一会儿，随着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哭声传来，使这位老妇完全清醒，原来她的儿媳又给她生了一个孙子。这个在神话中诞生的男孩，就是左宗棠。

左宗棠上有两个哥哥、三个姐姐，左家儿孙如此众多；但只有左宗棠是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最为喜爱的。有一次，左宗棠随祖父到山上去游玩，采了一些毛栗子，自己没舍得吃，回到家后，全部分给了哥哥、姐姐，自己却一点也没有留。对左宗棠的这一举动，祖父十分高兴，逢人便说：“宗棠将来必能成大器，左家的门庭将来一定拿靠他发扬光大的。”此话在五十年后果然得以应验。

左家尽管生活算不上富裕，但也勉强能称得上小康之

家，祖上遗留下数十亩田产，全年的生活费用多出自这些田产的地租。另外，因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，平日教书，也还有些收入。不过遇上灾年，全家也难以维持温饱。1807年，湖南湘阴一带一连几十天没下一滴雨，庄稼几乎，颗粒无收，左家就只能以糠饼充饥。左宗棠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耕读之家，因而，他了解平民的生活疾苦，这也正是他与一般纨绔子弟不同之处。

左宗棠从小饱读诗书，三岁识字，六岁读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，九岁时便已学做八股文了。1816年，父亲左观澜应聘去长沙教书，便也把左宗棠和两个哥哥都带上令一起上学。左观澜既是严父，又是严师，不管教读和作文，都依朱熹传注，“一字不许放过”，平时家庭生活亦“肃然亦然，尊卑上下，罔敢稍越”。这就使得左宗棠从懂事之日起，就接受了程朱理学的灌输，向往所谓“古人大节”。左宗棠非常聪明，尽管比两个哥哥年少很多，但做诗写文章都比两个哥哥强。有一次，左观澜教两个哥哥读篇文章，其中有一句是：“昔之勇士亡于二桃，今之廉士生于二李。”左观澜问他们：“二桃的典故出自什么地方？”哥哥们没来得及回答，左宗棠便在一旁抢先说道：“古诗《梁父吟》有这一句：‘一朝被谗言，二桃杀三士。’”左观澜很惊讶，因为一般五六岁的孩子是回答不上这样的问题的。原来哥哥们朗读诗文时，宗棠在一旁听到并记住了。从这可以看出，少年左宗棠的聪颖及记忆力是同龄儿童所不及的。

1826年，左宗棠第一次参加湖南湘阴县令主持的童子试便得以通过。第二年，他又顺利地通过了知府主持的府

试。然而等到由湖南学政亲临主持的院试时，左宗棠却因母亲病重未能参加，因而也就没有取得秀才的资格。此时，左宗棠为了走科举仕途之路，尽管仍旧研习八股制艺，但兴趣却大不似以前了，渐渐地把兴趣转移到了“经世致用”之学方面了。十八岁那年，他就阅读了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齐道南的《水道提纲》，并分别做了大量的笔记。这些书不但使左宗棠大开眼界，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掌握了一般八股文士子难能作得到的有用知识。

左宗棠在十九岁时，来到长沙和城南书院，师从贺熙龄做学问。贺熙龄对左宗棠要求极严，但又很喜欢他，曾做诗夸奖左宗棠说：“开口能谈天下事，读书先得古人心。”然而师长的赏识并没有帮助他仕途之路有所顺畅，二十岁时，左宗棠因没考上秀才，又别无进身之路，便借钱捐了个监生，以取得参加举人考试的资格。1832年，他参加湖南乡试之时，他的考卷本来已遭初次淘汰，却又侥幸地被主考官“搜遗”而出，被录取为湖南第十八名举人。随后，左宗棠与湘潭富家女周诒端结婚，结婚时，因左宗棠家里贫寒，无奈只好入赘周家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夫人周诒端不仅容貌姣好，且通情达理，博通书史。左宗棠在书房潜心攻读的时候，夫人就常常陪坐在身边，一面研墨、一面打图底，帮做摹绘等事。

1833年、1835年、1838年，左宗棠连续三次进京参加会试，但每次都是名落孙山。因每次进京的盘缠都是亲友馈赠的，且三次不第，使左宗棠觉得很没面子。然而科场的失意只给左宗棠带来暂时的困难。当他看出科举仕途之

路对他不通畅时，他便集中全部心思和精力研究“经世之学”。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地理学，包括军事地理和历史地理。除去潜心研读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总结历史上战争胜败的经验与教训和攻守双方形势之外，他还在夫人的帮助下，研究历史地理。他认为，古今之研习地理者，不是“索象于图”，就是“索理于书”，实际上经过若干年的变化，有关的资料已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，必须根据史书和志书重新研究校订。左宗棠根据有关地图制作等书籍，先绘了一张全国地图，然后又分开做各省的图。每幅图，都根据山川、道路和历代兵事的关系做了文字说明。他又摘抄了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，把山川、关隘、驿道远近，分门别类，订成几十本，题名《存余阁钞本史部》或《经部》。这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

（二）农学。古老的中国，向来“以农为本”，左宗棠深谙其中的道理，他特地从南京买来许多有关农学的书籍，与夫人周诒端一起“闭门伏读，实地考验”，他结合前人的经验，撰写了《广区田图说》一书，并把“区田”画成图样，做了说明，还在柳庄亲自试验这种区田的方法，取得成功后在附近农庄广为推广。后来左宗棠成了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。每到之处，他都特别注重发展农业，这与他这时的潜心研究是分不开的。

（三）清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的政治、经济问题。1840年，左宗棠应聘去安化已故的两江总督陶澍家教书，陶澍做了几十年的封疆大吏，家中收藏有许多的上谕和奏折，因陶澍的儿子陶杕是左宗棠的女婿，所以陶家所存的

档案图书资料任由他翻阅，他“因得饱读日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”，对清朝的经济、政治和社会都进行了深入的了解，并做了大量的研究。他以后的烜赫政绩，是与这些分不开的。

鸦片战争的爆发，侵略者的炮火震惊了左宗棠。1839年，当林则徐在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，左宗棠就广泛收集、阅读所能找到的各种记载外国情况的史志、别录，他曾多次写信给他的老师贺熙龄，要他帮助提供有关东南战事的情况。那时，英军在东南沿海恣意骚扰，他十分气愤，提出了“练鱼屯，设碉堡，简水卒，练亲兵，设水寨，省调发，编泊埠之船，设造船之厂，讲求大筏、软帐之利，更造炮船、火船之式”等具体抵御措施。当他得知清政府战和不定，林则徐被罢斥，琦善等人得志时，他说：林则徐是众望所归，若能继续受到重用，必能“周岭南千里之守”。他痛斥琦善等人以奸谋误国，贻祸边疆、贻祸子孙，应当斩首军前。

林则徐在云贵任总督时，曾邀左宗棠参加他的幕府，但因他要为陶澍之子教书，便没有去。以后，林则徐因病告退还乡，路过长沙时，特地约左宗棠在湘江的小船上相见，林则徐称他为“奇世之才”。他俩一面喝酒，一面纵谈古今大事，越谈越投机，直到第二天黎明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别。此次见面更加深了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敬仰，就是他在后来封侯拜相之时，还是认为与林则徐的此次会见是他一生中“第一荣幸”。

1850年12月，林则徐客死潮州。左宗棠闻知这一噩耗，不禁失声痛哭。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悼唁信给公子

镜帆，还写了一副被传诵一时的挽联，以表达自己对林公的怀念。

1843年，左宗棠靠教书的积蓄，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七十亩田地，“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”。但是，天下并不太平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国内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，农民运动风起云涌，使左宗棠“买山而隐”的愿望不能实现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，使左宗棠从此进入了军旅生涯。

二

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，给左宗棠带来了机会。当他准备效法诸葛亮“淡泊以明志”，与郭嵩焘一起选湘阴、长沙交界处的东山为“避地之约”时，传来了太平军已经攻占了广西的永安的消息。那时，他正在好友胡林翼的住所。左宗棠与胡林翼既是亲戚又是少年好友，两人在一起无话不谈。还在1833年初次入京会试期间，他曾与胡林翼“彻夜古今大政，论列得失原始要终，若预知海内将乱者，辄相与歔歔太息，引为深忧”。1844年，左宗棠听到安化、武陵、溆浦、桃源世界“皆有剧盗巢穴，党羽动辄数百人”，而朝廷的大小官员依然浑浑噩噩毫无紧张的样子，他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天下事败坏至此，百尔君子未闻有以，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，仕风臣节如此，古今未有也！天下无不了之事，无不办之寇，亦未尝无了之事，办寇之人；然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俗，则正未可知耳。”他预料在不久的将来，“借饷加赋诸弊政将

断此而起，天下事自此更难言矣”。此次面对太平军的勇猛攻势，左宗棠对胡林翼说：自古兵法有言，“谋定而后战”、“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”，清军应在太平军营附近广筑碉堡，步步为营，渐渐逼近，使太平军离开营垒，从而一举歼灭。

1852年4月，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猛不可挡，直指湖南长沙。清廷为了把太平军遏止在湖南，便调张亮基为湖南巡抚。胡林翼与张亮基都曾是云贵总督林则徐的左膀右臂，关系甚密。当胡林翼得知张亮基督任湖南的消息后，便多次致函张亮基，极力推荐左宗棠，说左宗棠“才晶超冠”、“廉介刚方，秉性良实，忠肝义胆，与时俗迥异”，且“胸罗古今地图兵法，本朝国章，切实讲求，精通时务”，希望张亮基能够重用。

张亮基做了几十年的封建官僚，深知当今朝中可用之人不多，各省督抚均是“文学侍从之臣”，对用兵打仗，多是一窍不通。所以当胡林翼向他推荐左宗棠时，他十分高兴，抵达常德后，立即派专人到湘阴礼聘左宗棠。那时左宗棠正在东山白水洞过着“流离荡析，茧足荒山”的生活，尽管也长叹“效国无门”，但对于张亮基的礼聘还是托辞谢绝了。因为左宗棠非常了解当朝官场的积弊，一向鄙视那些腐朽无能的大官僚，而他对张亮基又不甚了解，心存疑虑，没有应聘。后经左宗植和郭家兄弟的劝说，又想起林则徐曾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位“开爽敏干”的疆吏，才决定接受张亮基的礼聘。

1852年10月，左宗棠随同张亮基一起来到了长沙城。当时太平军已在城外与清军激战了二十多天，太平军不但

无力包围长沙城，反被清军三面包围，这对太平军来说，形势十分不利。但由于清军指挥不统一，怯敌畏战，也难以取胜。左宗棠进入长沙后，多方搜集军情，审度战场形势。他见太平军连攻长沙不下，很可能西渡湘江，便建议张亮基派军西渡湘江，据守土墙头、龙回潭，断绝太平军的粮食补给和西进之路，意图一举歼灭太平军。张亮基觉得左宗棠对局势分析准确，便下令让城外的清军照此而行，但清军均不听从命令，使得龙回潭等军事要地被太平军占据。左宗棠只好与江忠源等一起，死守长沙城。太平军连攻八十多天，久攻不克，精疲力尽，便放弃长沙，全军渡过湘江，经龙回潭向湖北进军。清军诸将帅至此才追悔当初没照左宗棠的策略行事，但时过境迁，为时已晚。然而尽管左宗棠歼灭太平军的想法未能实现，但在这次激战中，已显示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。

太平军撤离长沙，向湖北进军之后，左宗棠便帮助张亮基整饬吏治，安定社会秩序，平定湖南各路会党的势力。“征义堂”会员已达四千余人，堂址设在浏阳东乡。1853年1月，知府江忠源率兵前去围剿，左宗棠在其临行前说；一要快，二要准，要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心政策。照此说法，江忠源果真只用十二天就解散了“征义堂”。

1853年2月，张亮基因为“保全湖南”有“功”，被调署湖广总督，左宗棠随张亮基一起离开长沙，前往武昌，这时，张亮基不仅让左宗棠继续“专兵事”，而且各州县公事禀启也完全交左宗棠“一手批答”，督署机要，所有“批、答、咨、奏，皆（左）公一人主之”。实际上，张亮基把军政要务的大权都交给了左宗棠。对于张亮基的如此

信任，左宗棠十分感激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制军待我以至诚，事无巨细，尽委于我，此最难得。近时督抚，谁能如此？”在左宗棠的操持下，1853年9月仅以武昌三千疲弱兵勇，设伏团风镇，击溃由河南入湖北的北伐太平军余部，太平军的首领自认是出兵以来第一次狼狈的大败。1853年10月，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，仍邀左宗棠一同前往。左宗棠左右三思，不愿一同前往，便推辞“经手家务，不能远去”，返回他的白水洞，仍然做他的隐士。张亮基赴鲁之前，曾写信与胡林翼说：自己从抵湘之日起直到交卸鄂篆转赴山东时止，军政各务均“全恃季翁为我部署。此君天下才也，办土匪、歼粤匪，以战则克，以守则固，进贤进能激励兵将，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。仆何能为，皆季翁之力。吾兄为我请其出山，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”。由此可见，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里所起作用是何等之大。

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之时，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，当他得知左宗棠返回白水洞后，曾与布政使、按察使联名，派人携带书银入山邀请左宗棠出山入湘幕。但由于左宗棠对骆秉章缺乏必要的了解，便也婉言推辞了。

1854年3月，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汉口、汉阳，并继续西进，连下岳州、湘阴、靖港、宁乡。左宗棠在骆秉章的一再邀请下，于1854年4月，第二次进入湘抚幕府，任聘六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骆秉章对左宗棠亦“推诚相与，军事一切，专以相付”，从上递奏折到往来文书，均交左宗棠一手包办。而左宗棠帮助骆秉章的策略，只有八个字：“外援五省，内清四境”。那时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湖北、

江西都有湖南的援兵，并且都由湖南给饷。这样，太平军被限制在长江下游，而湖南境内一片太平祥和景象。因此有人说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。

左宗棠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呢？原来在清朝的历史上，湖南长久以来均是个平常的省份，既不大又不富，赋税收入有限，有时竟赶不上江浙的一个大府。而当时，湖南在全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日渐提高，而这一转变是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开始的，而以幕僚身份掌理湖南军政的左宗棠在这一时期的“经世”活动，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。

在左宗棠刚入湖南幕府时，财政极为困难。为了摆脱这种财政困境，他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。一是改革赋税征收办法，将原来大小官吏向百姓多收、浮收中饱私囊的部分改为法定的军务附加税，一律归公。附加税的数额比原来官吏们多收、浮收的数额低。这样，每年全省的税收增加了，而百姓的负担却减少了。二是设立局长，征收厘捐，也即收商业贸易税。从1856年5月起，湖南在郴州、宜章设局抽取盐厘、货厘，接着又在岳州各府普遍设厘局，每年共得厘金八十万两至一百二十万两，这些税收全部用于军饷。左宗棠曾用这些税收为曾国藩的湘军增建战船，接济粮饷，从而为湖南防务和操练湘军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。

左宗棠入湘幕之初，太平军军威正旺，所到之处，无不披靡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一些封建官僚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左宗棠则提出了“欲遏贼势，先固民心”的主

张。“固民心”的主要办法之一，就是鼓励地主士绅组织团练。因此，他就与团练大臣曾国藩一起，在湖南城乡广办团练和保甲。举办团练，是当时清王朝“制乱”的上方良策，除湖南以外，其他省份也有，但其他省份主要是从军事上着眼，借以“补兵力之不足”，然而所办团练往往被地主豪绅作为争权夺利的工具，有的转而抗粮抗官，而左宗棠、曾国藩等在湖南办的团练，则更多地从政治上着眼，力求能受其益而避其害。他们将“团”与“练”分开，而着重在“团”，主要是清查户口，实施保甲制度。乡团之外，尤重族团，强调“练团必先练族”，还特别刊发乡团执照、族团执照，“凡离匪、土匪、地棍均用重典，便宜行事”。因此湖南那时的局面较之以前大有好转。

咸丰初年，清朝的吏治十分败坏，尤其是湖南，“吏治之坏，甚于湖北，官吏操守不谨，一任门丁书役多方诈扰，以致是非淆乱，纲纪凌夷。”左宗棠认为，国家之强弱，其关键“视乎用人行政”，任用“贤能则治”，“奸庸窃位则乱”。于是他走访调查，考察湖南的州县官吏，结果是“稍可放心者不过五分之一”，因此需大加整治。于是，他与张亮基、骆秉章连续上奏，革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。只在1854年，就“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”。在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“勤恤民隐，严锄匪类”的廉官，则分别予以保奏，破格晋升。

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锋芒，无论是在政治上、财政上，还是军事上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由此，左宗棠的名声上下皆知，而且清廷对他也愈来愈加重视了。1856，破格提升他为兵部郎中，并赏戴花翎。与此同时，朝廷内外的